

## 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詩八首》二題

孫，明君

九州大学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院文学部門招聘外国人講師：清華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中文系：教授：中国文学

<https://doi.org/10.15017/10302>

---

出版情報：文學研究. 105, pp.83-97, 2008-03-01. 九州大学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院  
バージョン：  
権利関係：

## 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詩八首》二題

孫 明 君

【內容提要】關於謝靈運的《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的寫作年代歷來存在不同看法。本文認為謝靈運《擬鄴中》完成于烏衣之遊解散數年之後，大約在義熙十一年前後。學術界對謝靈運《擬鄴中》寫作動機的探究，主要有模擬說、隱喻說、再現說等。以上說法從不同的角度觸及了謝靈運詩歌的內在蘊涵——士族意識。《擬鄴中》是謝靈運士族意識在模擬之作中的折射，它透露了士族詩人對現實的不滿，在一定程度上再現了中古貴族生活的場景。與其說謝靈運在擬作中所表現的鄴中生活是一段讓人心儀的歷史追憶，不如說它是士族心目中的烏托邦世界。

### 一 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作年臆度

關於謝靈運的《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以下簡稱爲《擬鄴中》）的寫作年代，目前主要有三種看法。

第一種看法認爲《擬鄴中》的寫作與謝靈運和廬陵王劉義真的交遊相關。其中，有人認爲創作于劉義真去世之前，有人認爲完成于劉義真去世之後。清人何焯說：「當是與廬陵周旋時所擬」<sup>①</sup>。永初二年（四二二）正月，劉義真以揚州刺史改任司徒，此時，靈運任太子左衛率，顏延之任太子舍人。永初三年（四二三）五月宋武帝劉裕去世，七月謝靈運離開京城出守永嘉。可見「與廬陵周旋時」當指從永初二年（四二二）正月至永初三年（四二三）夏天這一段時間。

清人吳淇《六朝選詩定論》云：「及其擬子建詩，……使人知平原侯植之爲廬陵王義真耳。」顧紹柏先生認爲：「靈運這一組詩，大概作於元嘉三年至五年（西元四二六～四二八）。時靈運在京任秘書監，侍中。……如此不受重用，意甚不平，蓋由此而回憶起永初年間與廬陵王劉義真以及顏延之等朝夕相處的一段美好生活，自不免感慨良多，遂擬詩八首以寄其意。」<sup>(2)</sup>第二種看法認爲完成于謝靈運生命的最後幾年。方回《顏鮑謝詩評》云：「序云：『其主不文』，又曰：『雄才多忌』。使宋武帝、文帝見之，皆必切齒。蓋『不文』明譏劉裕，『多忌』亦誅徐、傅、謝、檀之所諱也。靈運坐誅，此序亦賈禍一端也。」他認爲靈運以「序」反抗現實，譏刺劉裕父子，此爲被殺害的原因之一。梅家玲教授認爲《擬鄴中》的寫作年代未可確考，但她同時又說：「則靈運擬作總序中的『歲月如流，零落將盡，撰文懷人，感往增愴』，便不僅是『魏文』的撰輯動機而已，它甚至還寄予了靈運的擬作動機；其所『懷』之『人』，不惟是鄴下諸子，亦是與其『以文章賞會，共爲山澤之遊』的親交友朋。」<sup>(3)</sup>據《宋書·謝靈運傳》可知，「山澤之遊」開始於元嘉五年（四二八），到了元嘉七年（四三〇）春天，「山澤之遊」的骨幹成員謝惠連離開了始寧，元嘉八年（四三一）謝靈運赴京上《自理表》，「山澤之遊」解散。元嘉十年（四三三）謝靈運在廣州被殺。如此看來，懷念「山澤之遊」的詩作當作於元嘉八年（四三一）前後。第三種看法由鄧仕梁先生提出，他說：「也不能排除作於早歲模擬用功於五言詩的可能性。」<sup>(4)</sup>以上三種看法中，第一種看法爲大多數學者所認同，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第二種看法無人公開提出，只是本文作者的推導。第三種看法是原文作者的推測之言，響應者寥寥。

自古以來，凡探討《擬鄴中》之寫作年代、寫作動機者，雖然最後的結論各不相同，但無不重視《擬鄴中序》。吳淇《六朝選詩定論》就說過：「康樂隱情，盡在此序中。作者依此爲柄而作，讀者依此爲柄而讀，斯得之矣。」如此說來，要探討《擬鄴中》的撰寫年代，我們也只能從《擬鄴中序》入手去考察。「序」云：「建安末，余時在鄴宮，朝遊夕燕，究歡愉之極。天下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並。今昆弟友朋，二三諸彦，共盡之矣。古來此娛，書籍未見，何者？楚襄王時有宋玉，唐景，梁孝王時有鄒、枚、嚴、馬，遊者美矣，而其主不文；漢武帝徐樂諸才，備應對之能，而雄

猜多忌，豈獲晤言之適？不誣方將，庶必賢於今日爾。歲月如流，零落將盡，撰文懷人，感往增愴。」這一段話提示我們：一是作者經歷過一段「朝遊夕燕」、「歡愉之極」的享樂生活，這一段生活已經成爲過去式，詩人對這段生活無限懷戀；二是當年一起遊宴的主要人物中已經有人離世，所以作者才會「撰文懷人，感往增愴」。

作爲高門士族子弟，謝靈運一生都衣食無憂，生活奢侈。相對來說，與友人「朝遊夕燕」、「歡愉之極」的生活主要集中在下面三段時間。一是青少年時代與族叔謝混等人的烏衣之遊。謝靈運十五歲時回到了建康城內謝氏府邸烏衣巷，與族叔謝混、從弟謝瞻、謝晦、謝曜、謝弘微等度過了數年遊樂生活。《宋書·謝弘微傳》云：「（謝）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晦、曜、弘微以文義賞會，常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之遊。混詩所言『昔爲烏衣遊，戚戚皆親姓』者也。其外雖復高流時譽，莫敢造門。」二是與廬陵王劉義真等人的京師之遊。《宋書·謝靈運傳》云：「廬陵王義真少好文籍，與靈運情款異常。少帝即位，權在大臣，靈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司徒徐羨之等患之，出爲永嘉太守。」《宋書·廬陵王傳》云：「義真聰明愛文義，而輕動無德業。與陳郡謝靈運、琅邪顏延之、慧琳道人並周旋異常，云得志之日，以靈運，延之爲宰相，慧琳爲西豫州都督。徐羨之等嫌義真與靈運、延之昵狎過甚，故使范晏從容戒之。義真曰：『靈運空疏，延之隘薄，魏文帝云鮮能以名節自立者。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悟賞，故與之遊耳。』」三是與從弟謝惠連等人的「山澤之遊」。《宋書·謝靈運傳》云：「靈運以疾東歸，而遊娛宴集，以夜續晝，復爲禦史中丞傅隆所奏，坐以免官。是歲，元嘉五年。靈運既東還，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泰山羊之，以文章賞會，共爲山澤之遊，時人謂之四友。惠連幼有才悟，而輕薄不爲父方明所知。靈運去永嘉還始甯，時方明爲會稽郡。靈運嘗自始寧至會稽造方明，過視惠連，大相知賞。時長瑜教惠連讀書，亦在郡內，靈運又以爲絕倫，謂方明曰：『阿連才悟如此，而尊作常兒遇之。何長瑜當今仲宣，而飴以下客之食。尊既不能禮賢，宜以長瑜還靈運。』靈運載之而去。」

這三個時段的遊樂體驗，都有可能成爲《擬鄴中序》中「朝遊夕燕」、「歡愉之極」的素材和背景。「山澤之遊」之時，

以謝靈運爲核心。那麼有可能是謝靈運自比爲曹丕，以族弟謝惠連、友人何長瑜、荀雍、羊之等人比附鄴下文人。但是，「山澤之遊」的成員並沒有人離世，不符合「撰文懷人，感往增愴」的條件，應該排除。由於同樣的原因，「當是與廬陵周旋時所擬」的看法也應該否定。

假設京師之遊果然是「朝遊夕燕」、「歡愉之極」的原型，那麼，劉義真是當然的領袖，組詩應該是以劉義真比附曹丕，以謝靈運、顏延之、慧琳道人比附鄴下文人。顧紹柏先生即持這種觀點，他說：「劉義真是靈運諸人的領袖，正如曹丕不是鄴中文人的領袖一樣，因此靈運一再稱頌曹丕而無微詞；如果《平原侯植》這首詩是寫曹植遭受曹丕迫害從而影射劉義真無辜被害，那就會造成主題的分裂，這不符合靈運的本意。」<sup>(5)</sup>的確，詩人並沒有借曹植以隱喻劉義真。同時，詩人也並非要借曹丕以隱喻劉義真。組詩涉及到了八人，除了曹丕曹植兄弟之外，鄴下文士都已經「零落」，面對當年「朝遊夕燕」之時的作品，組織者主持者「魏太子」寫序以緬懷過去，抒發感傷之情。而劉義真早已離世，是詩人懷念的對象，並不符合組織者主持者的標準。同樣的道理，謝混雖然是「烏衣之遊」中的領袖人物，但他在義熙八年（四二二）下獄而死，也不能作爲組詩的組織者和主持者。

如此看來，烏衣之遊、京師之遊和「山澤之遊」都不能完全對應《擬鄴中序》。長期以來，我們都過分依賴於《擬鄴中序》，過分誇大了《擬鄴中序》的作用。以上分析表明，要探討《擬鄴中》的撰寫年代，不能只是膠著於《擬鄴中序》。詩人在現實中的體驗和情感只是爲《擬鄴中序》的寫作提供了一個參照背景而已。根據對《擬鄴中》的寫作環境，寫作動機的考察，本文作者推斷《擬鄴中》完成于烏衣之遊解散之後，大約在義熙十一年前後。理由如下：

六朝時期，模擬的風氣興盛。《宋書·謝靈運傳》云：「靈運少好學，博覽群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自然不會服氣古人。謝靈運對於同樣出身于高門士族的西晉詩人陸機非常推重。日本學者藤井守先生認爲：「由謝靈運樂府詩與陸機樂府詩關係之深，完全可以推想謝靈運的全部樂府詩都是模仿陸機作品而創作的。」<sup>(6)</sup>包括曹植詩歌在內的建安五言詩與《古詩十九首》雙峰並峙，陸機模擬了《古詩十九首》中的十二首，獲得了極高的聲譽。那麼，模擬鄴下文

士之作對於謝靈運來說自然具有非同尋常的吸引力。一般來說，用功模擬的情況，大都發生在青少年時代。

義熙八年（四一二）八月謝混死，尚在劉毅軍中任職的謝靈運作有《贈安成》致謝瞻。義熙十一年（四一五）至義熙十二年（四一六），謝靈運集中創作了多首給同族兄弟的贈答詩。義熙十一年夏天有《贈安成》致謝瞻，同年十月有《贈從弟弘元》寄謝弘元。義熙十二年有《愁霖》寄謝瞻，有《贈從弟弘元時爲中軍功曹住京》寄謝弘元。以上詩歌中追憶當年烏衣之遊，爲烏衣之遊的風流雲散而不勝感慨。《答中書》其二云：「伊昔昆弟，敦好閭裏。我暨我友，均尚同恥。仰儀前修，綢繆儒史。亦有暇日，嘯歌宴喜。」《贈從弟弘元時爲中軍功曹住京》其四云：「契闊群從，繾綣遊娛。歷時越歲，寒暑屢徂。接席密處，同軫修衢。孰云異對，翔集無殊。」這裏不僅有對「朝遊夕燕」、「歡愉之極」之生活的無限懷戀之情，其中也隱含著時光飄忽的感歎，此與《擬鄴中序》中的情感大體吻合。也許組詩《擬鄴中》與以上提及的家族詩完成於同一時期吧。

今天我們把謝靈運稱爲山水詩人，但從現存作品看，在謝靈運49年的人生中，山水詩的寫作開始於永初三年（四二二），這一年詩人38歲。在此之前詩人很少有山水描寫，也看不出詩人在山水描寫方面的才華。《擬鄴中》中山水描寫成分不僅很少而且質實樸素，不似後期所作。也許我們會理解爲詩人之所以這樣寫，是爲了模仿鄴下文士詩歌的原貌。但對照後可以發現，謝靈運擬詩中的山水描寫遠遠少於鄴下遊宴詩。僅以曹丕、曹植詩歌爲例：曹丕《芙蓉池作詩》中寫到：「雙渠相溉灌，嘉木繞通川。卑枝拂羽蓋，修條摩蒼天。驚風扶輪轂，飛鳥翔我前。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上天垂光彩，五色一何鮮。」曹丕《於玄武陂作詩》云：「野田廣開闢，川渠互相經。黍稷何鬱鬱，流波激悲聲。菱芡覆綠水，芙蓉發丹榮。柳垂重蔭綠，向我池邊生。乘渚望長洲，群鳥歡擘鳴。萍藻汜濫浮，澹澹隨風傾。」詩中描繪了西園美麗的夜景，有動有靜，有聲有色，讓人賞心悅目。謝靈運《擬魏太子》中云：「百川赴巨海，衆星環北辰。照灼爛霄漢，遙裔起長津。……澄觴滿金壘，連榻設華茵。」其中，「百川」四句是比興手法，不是純粹寫景。最後兩句也不是對具體景色的描繪。曹植《公燕詩》云：「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明月澄清影，列宿正參差。秋

蘭被長阪，朱華冒綠池。潛魚躍清波，好鳥鳴高枝。神飆接丹轂，輕輦隨風移。」水清木華，美景可畫。謝靈運《擬平原侯植》中寫道：「朝遊登鳳閣，日暮集華沼。傾柯引弱枝，攀條摘蕙草。……平衢修且直，白楊信裊裊。」相比之下鄴下游宴詩更加清麗明秀，而謝靈運的擬作更顯素樸質實，這與他後期芙蓉出水般的山水詩迥然不同。如此，我們估計《擬鄴中》應該寫作于詩人對山水描寫還不純熟的38歲之前。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謝靈運《擬鄴中》完成于烏衣之遊解散數年之後，大約在義熙十一年前後。

## 二 《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中的士族意識

回顧謝靈運詩歌研究史，我們會發現學術界對謝靈運《擬鄴中》寫作動機的探究，主要有三種看法：一、模擬說；二、隱喻說；三、再現說。以上三種說法皆有一定的道理，而且三種說法從不同的角度觸及了謝靈運詩歌的內在意蘊——士族意識。可以說《擬鄴中》是謝靈運士族意識在模擬之作中的折射，它透露了士族詩人對現實的不滿，它在一定程度上再現了中古貴族生活的場景。與其說謝靈運在擬作中所表現的鄴中生活是一段讓人心儀的歷史記憶，不如說它是士族心目中的烏托邦世界。

六朝時代盛行擬作前人作品的風氣。王瑤先生說：「這種風氣既盛，作者也想在同一類的題材上，嘗試著與前人一較短長，所以擬作的風氣便越甚了。……因之較量作者們才能的高下，或當作露才揚己的方法，也常有數人同時就一個題目作文的情形。曹魏時的命題共作，就是例子。……這種風氣一直為後來的文人所景慕，所以謝靈運的集中還有《擬魏太子鄴中集》。」在那個時代，成功的擬作不唯不會受人詬病，而且會受到評論家的推重。《文選》「雜擬」類中收錄有陸機《擬古詩十二首》、陶淵明《擬古詩》、謝靈運《擬鄴中》、鮑照《擬古三首》等著名詩人的擬作，鍾嶸在《詩品序》中，把陸機的《擬古詩》、謝靈運的《擬鄴中》與曹植的《贈白馬王彪》、阮籍《詠懷詩》等作品並列，譽之為「五

言之警策者」，「篇章之珠澤，文采之鄧林」。唐人皎然在《詩式》中說：「至於《述祖德》一章，《擬鄴中》八首，《經廬陵王墓》，《臨池上樓》，識度高明，蓋詩中之日月也，安可攀援哉！……故能上躡《風》《騷》，下超魏晉，建安之作，其椎輪乎！」然而，到了後代，包括謝靈運《擬鄴中》在內的擬古詩就越來越受到了冷落。清人方東樹云：「康樂《擬鄴》詩及擬古諸作，不必不佳，然實無謂。」（《昭昧詹言》卷五）。當代學者說：「近人論文多反對模擬，有的甚至認為這是沒有出息的表現。」<sup>(8)</sup>在反對模擬者看來，謝靈運的擬作只是爲了模擬而模擬，爲了形式而形式，所以是無謂之作。

謝靈運爲什麼要選擇鄴下詩歌來模仿呢？首先由於鄴下文學的成就對謝靈運具有強烈的吸引力。皎然《詩式》曰：「鄴中七子，陳王最高。劉楨辭氣偏；王得其中。不拘對屬，偶或有之。語與興驅，勢逐情起，不由作意，氣格自高，與《十九首》其一流也。」在五言詩發展史上，《古詩十九首》與建安詩歌佔有重要位置，《古詩十九首》被鍾嶸譽爲「驚心動魄，幾乎可謂一字千金」（《詩品》），這組詩中的部分作品已經被西晉士族詩人陸機所模擬，並獲得了良好的聲譽。爲了表現其可以與曹丕、曹植兄弟及鄴下諸子對峙的文學才華，爲了顯示自己可以與太康之英陸機一較身手的本領，謝靈運選擇了鄴下詩歌作爲自己模擬的對象。較之於模擬《古詩十九首》，《鄴中集》因爲是對具體詩人詩作的模擬，所以擬作的要求更高，難度更大，而這樣對於一心想炫耀自己才藻的謝靈運來說，更加具有刺激性和挑戰性。雖然不能說想要露才揚己，與前人一較短長的必然是士族詩人，但可以說富有文化優越感的士族詩人這樣的願望更加強烈，陸機和謝靈運就是其中的典型。

其次，雖然說曹丕兄弟所領導的鄴下文學並不等於貴遊文學，但它非常接近于貴遊文學，這也是士族詩人謝靈運選擇《鄴中集》作爲類比物的動機之一吧。建安文學所形成的「建安風骨」，與「盛唐氣象」一起成爲後世文人心儀的對象。劉勰是這樣描述建安文學的：「暨建安之初，五言騰踴，文帝陳思，縱轡以聘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文心雕龍·明詩》）「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灑筆



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文心雕龍·時序》）我們今天所說的建安時代實際上是二曹在創作上所活躍的時代，它不僅包括了漢獻帝建安年間（一九六～二二〇），還包括了魏文帝黃初年間（二二〇～二二六）和魏明帝太和年間（二二七～二三二）。太和六年（二三二）建安之傑曹植離開了人世，標誌著建安文學帷幕的最後降落。曹操與鄴下諸子先後去世，曹丕因為政務繁忙黃初年間很少創作，整個黃初年間和太和年間只有曹植一個人在偏僻處孤獨地吟唱著。建安年間（一九六～二二〇）的文學創作可以分爲前後兩個時期，建安前期「獻帝播遷，文學蓬轉」，「世積亂離，風衰俗怨」，詩歌多寫社會動亂和流離飄零之苦。「建安之末，區宇方輯」，諸子先後聚集於鄴下，出現了「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之作。劉勰所謂的「建安之末」具體來說應該是曹操將大本營建立在鄴下，王粲等人依附曹氏父子之後的一段時光。本文作者認爲大約是指建安十三年（二〇八）至建安二十二年（二二七）之間。從建安十三年（二〇八）至建安二十二年（二二七）十年之間，曹丕、曹植兄弟在鄴下時常組織遊宴活動。鄴下諸子的活動記載在各自的遊宴詩中，也保留在曹丕的《與吳質書》《又與吳質書》等文獻中。這樣一種貴族生活情景讓後世的士族詩人無限嚮往。謝靈運沒有選擇建安時代的血與火，沒有選擇民生的哀號，沒有選擇英雄的吶喊，而自覺地選擇了「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之作作爲自己類比的對象並不是偶然的現象，而是其士族情感，士族意識所註定的。

除了模擬說，另一種流傳長久的說法是隱喻說。方回《顏鮑謝詩評》云：「序云：『其主不文』，又曰：『雄才多忌』。使宋武帝、文帝見之，皆必切齒。蓋『不文』明譏劉裕，『多忌』亦誅徐、傅、謝、檀之所諱也。靈運坐誅，此序亦賈禍一端也。」他認定謝靈運以序來譏刺劉裕父子，最後惹來殺身之禍。吳淇《六朝選詩定論》認爲：「諸子中，唯仲宣才高而望重，故康樂首取以自況。……康樂自視過高，故獨寫此意于擬王詩者，特借自傷之情，以表己之爲王粲也。」可以肯定，《擬鄴中》並不僅僅是簡單的仿擬之作，其中也浸潤著詩人的身世懷抱，反應了謝靈運複雜的接受心態。<sup>9</sup>其中包含著詩人不滿現實的成分，也有反抗現實的因素，所以說謝靈運借前人之境來抒發自我之情是毋庸置疑的。但

是，隱喻說當中也有可以商榷之處，其一是後人在探討隱喻之時有穿鑿之處。顧紹柏先生說：「清吳淇、吳汝綸以為靈運是借曹植以隱喻廬陵王劉義真，不免穿鑿。……劉義真是靈運諸人的領袖，正如曹不是鄴中文人的領袖一樣，因此靈運一再稱頌曹丕而無微詞。」<sup>10</sup>不僅曹植以隱喻廬陵王劉義真，借王粲來隱喻謝靈運自己的觀點有穿鑿附會之嫌，而且將任何一個晉宋人物直接比附與鄴下文人的觀點都有主觀臆斷之嫌，通達的看法是：「謝靈運可能並沒有將自己刻意比為某人，而是在每個人的身世遭遇中都灌注了自己的思想情感，從而達到與諸子相彌合、相交融的境界。」<sup>11</sup>同時，我們認為謝靈運的確對現實有所不滿，但是在不同的人生階段，他對現實不滿的程度，應該有所不同，說《擬鄴中》的序是導致詩人被殺的重要原因並沒有確鑿的證據，只是後人的推斷。本文認為《擬鄴中》的主旨比較複雜，其中有炫才之意，有不平之氣，有對昔日生活的再現，有對理想之境的塑造，似乎不能用抒發自己生不逢時、懷才不遇的不平之氣來概括。

周勛初先生說：「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之作，成了後人學習的典範。……可見謝靈運的撰寫此文，實由嚮往鄴下風流而起。他想通過系列的擬作，重現這一文學群體中人的心態和風采。」<sup>12</sup>梅家玲先生說：「當謝靈運以魏文和鄴中諸子的口吻各抒其情時，鄴下歡會的情景，便融合了靈運的現時情懷，在其筆下宛然再現。……而文學的『傳統』，遂不斷在各代作家對前人作品的回顧玩味下，以日形豐富的內涵，融入其『再演』的過程，以完成薪火相繼的『創新』。據此，則漢晉以來擬代體的寫作，其實可以視為時人重溫過去、參與現時、迎向未來的一種生命體驗。」<sup>13</sup>朱曉海先生說：「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的著眼重心與其說是在擬詩，不如說是在重擬那鄴中遊本身。」<sup>14</sup>以上說法都強調了謝靈運對鄴下歡會情景的再現、再演、重擬，這樣的看法無疑是深刻而有見地的。

謝靈運《擬魏太子詩並序》云：

建安末，余時在鄴宮，朝遊夕燕，究歡愉之極。天下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並。今昆弟友朋，二三諸彦，共盡之矣。古來此娛，書籍未見，何者？楚襄王時有宋玉、唐景，梁孝王時有鄒、枚、嚴、馬，遊者美矣，

而其主不文；漢武帝徐樂諸才，備應對之能，而雄猜多忌，豈獲晤言之適？不誣方將，庶必賢於今日爾。歲月如流，零落將盡，撰文懷人，感往增愴。其辭曰：

百川赴巨海，衆星環北辰。照灼爛霄漢，遙裔起長津。

天地中橫潰，家王拯生民。區宇既滌蕩，群英必來臻。

忝此欽賢性，由來常懷仁。況值衆君子，傾心隆日新。

論物靡浮說，析理實敷陳。羅縷豈闕辭？窈窕究天人。

澄觴滿金壘，連榻設華茵。急弦動飛聽，清歌拂梁塵。

何言相遇易，此歡信可珍。

謝靈運所傳達的情感來源於曹丕的《與吳質書》、《又與吳質書》及其遊宴詩。《與吳質書》云：「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棋間設，終以博奕，高談娛心，哀箏順耳。弛驚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賓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爲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爲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時，景風扇物，天意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遊，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托乘于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曹丕《又與吳質書》云：「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熟，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爲一集。觀其姓名，已成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糞壤，可複道哉！」對照兩者，可以看到《擬魏太子詩並序》似乎是在努力再現這種情感、這種場景。

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看，且不說鄴下歡會情景的是否可以再現、再演，甚至連鄴下歡會的情景是否完全真實都

是值得懷疑的。縱然曹丕的記憶、記述是真實的，但其他人未必有與曹丕完全吻合的記憶。在諸子的記憶中，鄴下的天空並不是如此晴空萬里、陽光明媚。這裏會有電閃雷鳴，也有陰雨連綿的日子。王粲等六子的詩歌中既有對曹操的讚頌，與曹丕曹植兄弟的友誼，也有與曹氏父子之間的摩擦。鄴下諸子「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曹植《與楊德祖書》），自視甚高，意欲建永世之功，他們希望能夠被委以軍國重任，所以對最高統治者把他們看作文士並不滿意，王粲的《雜詩》「日暮遊西園」等顯示出詩人在鄴城生活時期亦有許多無法擺脫的煩惱，在《雜詩》其四中詩人甚至說：「邂逅見逼迫，俯仰不得言。」他們渴望建功立業，對安排自己作瑣碎的文書工作心懷不滿。劉楨的《雜詩》表明士人對文墨翰籍工作的煩惱。所以，我們認為謝靈運《擬鄴中》的著眼重心與其說是在重擬那鄴中之遊本身，不如說是在擬曹丕心中的鄴中之遊。

擬作中的生活場景對於謝靈運而言並不陌生。早年的謝靈運有烏衣之遊，中年後與廬陵王等人的京師之遊，也有與謝惠連等人的山澤之遊。烏衣之遊見前引之《宋書·謝弘微傳》。《宋書·廬陵王傳》載：「義真聰明愛文義，而輕動無德業。與陳郡謝靈運，琅邪顏延之，慧琳道人並周旋異常，雲得志之日，以靈運、延之爲宰相，慧琳爲西豫州都督。徐羨之等嫌義真與靈運、延之昵狎過甚，故使范晏從容戒之。」也有與謝惠連等人的山澤之遊：《宋書·謝靈運傳》云：「靈運既東還，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泰山羊之，以文章賞會，共爲山澤之遊，時人謂之四友。」但是，既然是模擬之作，理應在作者青年時代，不應該在中年之後。

謝靈運對鄴中遊宴的選擇，過濾、重塑，其實有烏衣之遊的影子。烏衣之遊有助於詩人更加細緻親切的去體會和復原鄴下之遊的貴族生活場景。

《擬鄴中》是模擬之作，但又不是純粹的模擬之作；《擬鄴中》試圖再現鄴下之遊，但又不是鄴下之遊的翻版；《擬鄴中》是烏衣之遊的折射，但又不是烏衣之遊的臨摹。作者在鄴下之遊中加入了很多自己的想像。詩人所呈現給我們的世界實際上是一個以鄴下之遊爲原型的烏托邦世界。

這個理想世界自然會讓我們聯想到陶淵明在《桃花源記並詩》中所勾勒的桃花源。《桃花源記》云：「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才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

生活在晉宋易代之際的陶淵明和謝靈運，不約而同地創作了表現其各自理想社會的烏托邦世界。他們的烏托邦世界也有一些相同之處：

其一，兩者都有歷史原型。雖然有人把《桃花源記》看作「唐以前第一篇小說」，但是，也有人始終認爲桃花源不是作者杜撰的地名，而是客觀的存在。至於桃花源到底在什麼位置，有各種各樣的說法。<sup>16</sup>陳寅恪先生認爲：「真實之桃花源在北方之弘農，或上洛，而不在南方之武陵。……《桃花源》紀實之部分乃依據義熙十三年春夏間劉裕入關時戴延之等所聞見之材料而作成。」<sup>16</sup>我們認爲，在陶淵明時代應該有類似於桃花源的文字記載或口頭傳說，受它的啓發，糅合詩人自己的理想，於是出現了文學作品《桃花源記》。其二，兩者都是詩人理想社會的化身，這裏沒有戰爭，沒有動亂。其中都含有不滿現實的成分。其三，兩種世界，一個宛如仙境，一個史無前例，皆是富有詩情畫意的理想境界。「謝靈運非常能掌握曹丕的心境，以及對昔遊此完美事件的認知：短促、脆弱、偶然、現實經驗意義的不可重複，但他的巧思令他領悟到昔遊的另一重要方面：不朽。」<sup>17</sup>《桃花源記》云：「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志，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進入桃花源的路是那麼迷離神奇，同樣具有短促、脆弱、偶然、現實經驗意義的不可重複的特色。

兩者之間的區別也非常明顯。如果說陶淵明的桃花源所描繪的是一個平民階層的烏托邦，那麼謝靈運的鄴下之遊則是一個屬於貴族階層的烏托邦。

其中所出現的人物各不相同。先看陶淵明的桃花源，在典型的自然經濟狀況下，人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人耕作。這裏的人們，淳樸、平和、善良、安逸，處於自然狀態中，沒有受到世俗的污染。這裏沒有階級，也沒有不同的階層，人與人之間互相平等。與之相反，《擬鄴中》中出現的是魏太子、公子及國家官員、社會名士，他們才華橫溢，自視甚高。《擬鄴中》中有君臣關係，有貴賤等級，但是由於主上的仁厚，君臣之間情誼深厚。在太子眼裏：「古來此娛，書籍未見，何者？楚襄王時有宋玉、唐景，梁孝王時有鄒、枚、嚴、馬，遊者美矣，而其主不文；漢武帝徐樂諸才，備應對之能，而雄猜多忌，豈獲晤言之適？不誣方將，庶必賢於今日爾。」（《擬魏太子詩並序》）「天地中橫潰，家王拯生民。區宇既滌蕩，群英必來臻。忝此欽賢性，由來常懷仁。況值衆君子，傾心隆日新。」（《擬魏太子詩》）這樣的體會並不是太子一個人的自我感覺，它也是所有文士的共同感受：「上宰奉皇靈，侯伯咸宗長。雲騎亂漢南，紀郢皆掃蕩。排霧屬盛明，披雲對清朗。慶泰欲重疊，公子特先賞。不謂息肩願，一旦值明兩。」（《擬王粲》）「相公實勤王，信能定螫賊。複覩東都輝，重見漢朝則。餘生幸已多，矧乃值明德。愛客不告疲，飲燕遺景刻。」（《擬陳琳》）「末塗幸休明，棲集建薄質。已免負薪苦，仍遊椒蘭室。」（《擬徐幹》）「矧荷明哲顧，知深覺命輕。」（《擬劉楨》）「天下昔未定，托身早得所。官度廁一卒，烏林預艱阻。晚節值衆賢，會同庇天宇。」（《擬應瑒》）「自從食萍來，唯見今日美。」（《擬阮瑀》）文士們對曹操非常敬仰，與曹丕兄弟情誼深厚。

人物的生活狀態不同。在桃花源中，人人需要勞動耕作，沒有剝削，沒有賦稅，人們過著自我享受的農業平均主義生活。在鄴下，文士們也許具有高遠的理想，也許經歷過流離之苦，也許曾經在敵方的陣營，也許生活在饑寒交迫之中，但現在那些往事都已經化為淡淡的清煙，消逝在彼此眼前。此時的文士們盡日遊戲飲酒，個個都心滿意足。《擬王粲》云：「並載遊鄴京，方舟泛河廣。綢繆清燕娛，寂寥梁棟響。既作長夜飲，豈顧乘日養！」《擬陳琳》云：「餘

生幸已多，矧乃值明德。愛客不告疲，飲燕遺景刻。夜聽極星闌，朝遊窮曠黑。哀哇動梁埃，急觴蕩幽默。且盡一日娛，莫知古來惑。」《擬徐幹》云：「未塗幸休明，棲集建薄質。已免負薪苦，仍遊椒蘭室。清論事究萬，美話信非一。行觴奏悲歌，永夜系白日。」《擬劉楨》云：「朝遊牛羊下，暮坐括揭鳴。終歲非一日，傳卮弄新聲。辰事既難諧，歡願如今並。唯羨肅肅翰，續紛戾高冥。」《擬應瑒》云：「晚節值衆賢，會同庇天宇。列坐蔭華棖，金樽盈清醕。始奏延露曲，繼以闌夕語。調笑輒酬答，嘲諢無慚沮。傾醕無遺慮，在心良已敘。」《擬阮瑀》云：「念昔渤海時，南皮戲清汎。今復河曲遊，鳴葭泛蘭汜。躡步陵丹梯，並坐侍君子。妍談既愉心，哀弄信睦耳。傾醕系芳醕，酌言豈終始。」《擬平原侯植》云：「副君命飲宴，歡娛寫懷抱。良遊匪晝夜，豈云晚與早。衆賓悉精妙，清辭灑蘭藻。哀音下回鶻，餘哇徹清昊。」這些詩句中看不出詩人的理想壯志，他們似乎沉浸在盡情享樂之中，樂而忘返。

本文認爲：《擬鄴中》是對鄴下文壇遊宴之作的模仿，也是對陸機《擬古詩》的攀比。《擬鄴中》雖然試圖再現鄴下游宴生活，但與鄴下之遊的史實有較大出入，詩中也有對謝氏家族烏衣之遊的追憶，是烏衣之遊的折射。從本質上看，《擬鄴中》所表現的鄴下之遊乃是一個屬於貴族階層的烏托邦世界。

### 注

- (1) 何義門，孫義峰《評注昭明文選》卷七。
- (2) 顧紹柏《謝靈運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第一三七頁。
- (3) 梅家鈴《漢魏六朝文學新論——擬代與贈答篇》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版，第三〇頁。
- (4) 轉引自梅家鈴《漢魏六朝文學新論——擬代與贈答篇》，第二七頁。
- (5) 顧紹柏《謝靈運集校注》第一五六頁。
- (6) 藤井守《謝靈運的樂府詩》宋紅編譯《日韓謝靈運研究譯文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版，第六九頁。
- (7) 王瑤《中古文學史論》，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第二〇三頁。

- (8) 周勛初《魏晉南北朝時文壇上的模擬之風》，《魏晉南北朝文學與文化論文集》，南開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版。
- (9) 尚永亮，鄧軼蘭《擬鄴中集詩八首》的詠懷性質與謝靈運的接受心態，《中國韻文學刊》，二〇〇四年一期。
- (10) 顧紹柏《謝靈運集校注》，第一五六頁。
- (11) 尚永亮，鄧軼蘭《擬鄴中集詩八首》的詠懷性質與謝靈運的接受心態。
- (12) 周勛初《魏晉南北朝時文壇上的模擬之風》。
- (13) 梅家鈴《漢魏六朝文學新論——擬代與贈答篇》，第五九頁。
- (14) 朱曉海《讀〈文選〉之〈與朝歌令吳質書〉等三篇書後》，《廣西師範大學學報》，二〇〇四年一期。
- (15) 參見鍾優民《陶學發展史》，吉林教育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第二八三～二八五頁。
- (16) 陳寅恪《桃花源記》旁證，《陳寅恪史學論文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第二三四頁。
- (17) 朱曉海《讀〈文選〉之〈與朝歌令吳質書〉等三篇書後》。